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总编 李 新

中华民国史

第七卷
(1928—1932)

曾业英 黄道炫 金以林 等著

中华书局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总编 李 新

中华民国史

第七卷

(1928-1932)

曾业英 黄道炫 金以林 等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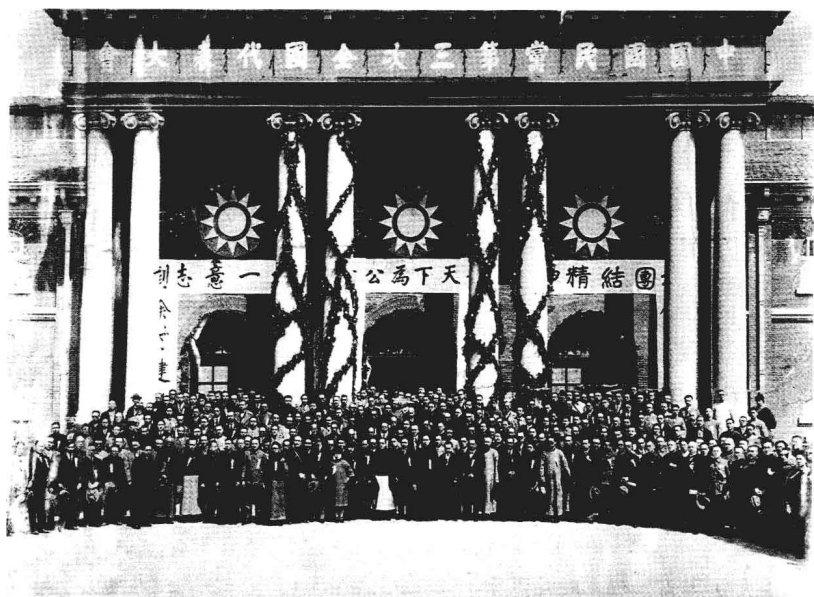
中华书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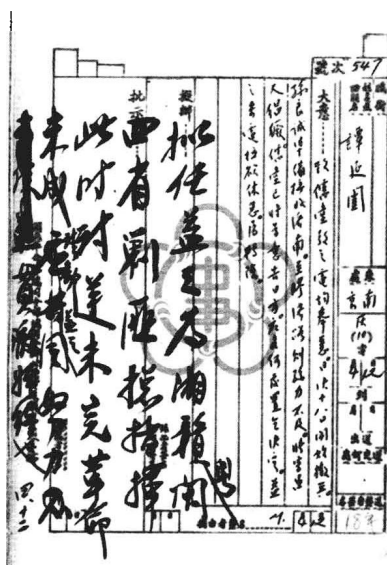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成员合影。



編遣会议合影。



国民党“三大”代表合影。



1929年4月，蒋介石布置进攻红军电。



孙中山奉安大典行进途中。



蒋介石。



冯玉祥。



汪精卫、胡汉民、孙科。



阎锡山。



1929年6月6日，杭州西湖博览会开幕典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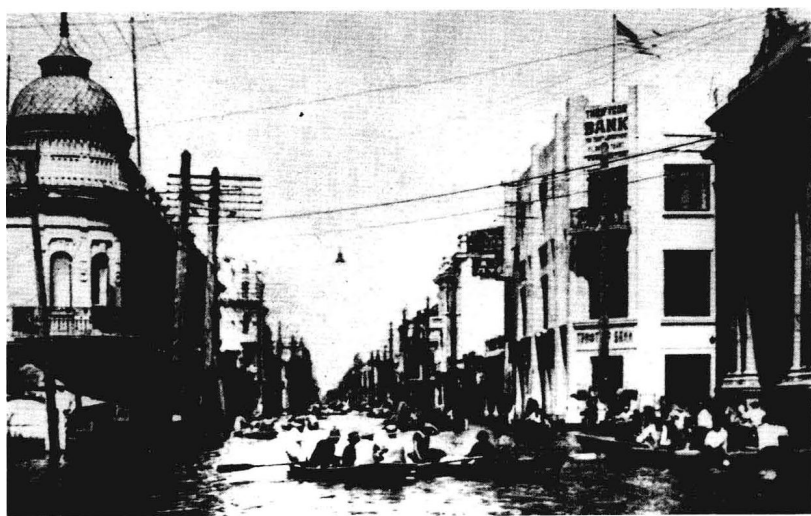
老板你不在家你的米
我买了廿八斤存二无
存 在 观 泗 老 板 手 札

红军

红军向老百姓买米的字条。



红军女兵。



武汉大水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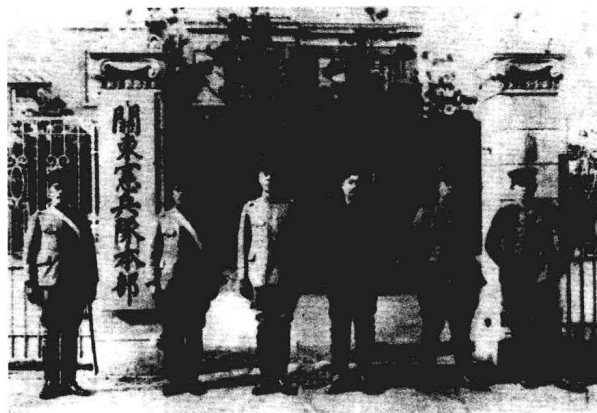
中原大战爆发前在潼关集合的冯玉祥部炮兵。



参加中原大战的东北军进入天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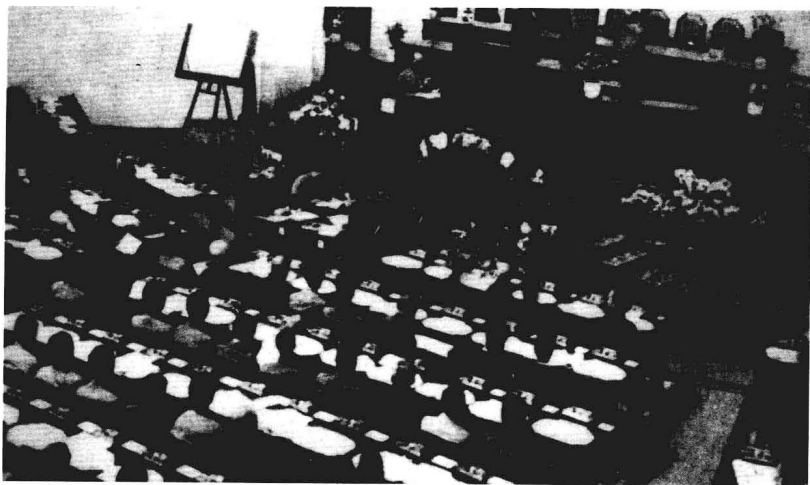
“九一八”事变时侵入沈阳的日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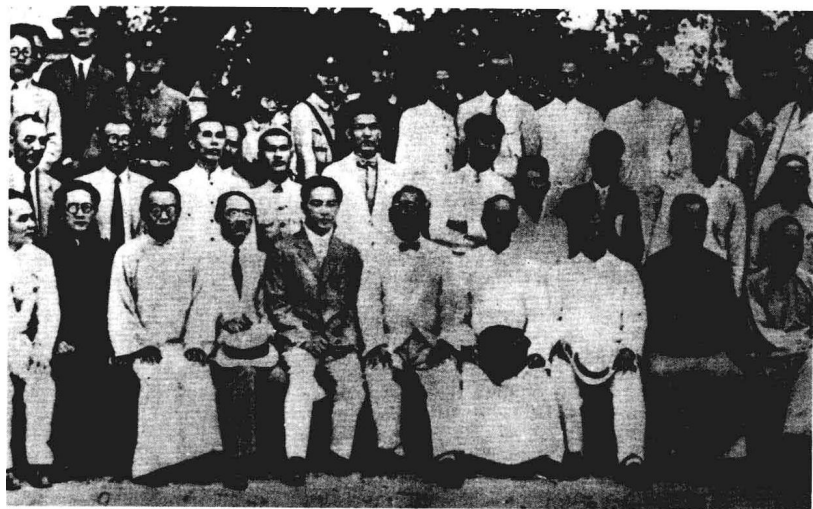
日本关东宪兵队本部。



日军残害中国抗日志士。



蒋介石在南京国民会议致辞。



1931年5月，国民党实力派在广东成立国民政府。

前 言

本卷记述的是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初期的历史，主要反映国民党“二次北伐”告成后，以蒋介石为主导的南京国民政府各派政治、军事势力，由互争正统和派系利益到联合统治基本确立的过程。上起 1928 年 6 月，下迄 1932 年 3 月蒋介石被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计三年又八个月。

1928 年 4 月国民党举行“二次北伐”，6 月进占北京，结束了盘踞北京长达十六年的北洋军阀的统治。随后，新疆杨增新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表示新疆各界议决服从国民政府，奉行三民主义，并改组省政府，一律悬青天白日旗，以归统一。张学良也于半年后的 12 月 29 日，与张作相、万福麟、翟文选、常荫槐等人发表联名通电，表示东北自即日起改易旗帜，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南京国民政府。而西南川、滇、黔等边远省份的地方军阀如杨森、刘湘、刘文辉、龙云等则早在 1926 年 7 月广东国民革命军出发北伐以后即已陆续内附南京国民政府。至此，除 1927 年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中共建立的各地农村革命根据地外，全国已形式上归顺南京国民政府，初步形成了国家的统一局面，南京国民政府成为新的中央政权。

尽管这一局面的形成，特别是张学良“东北易帜”，对蒋介石此后的政治前途意义重大，但并不等于蒋介石已就此确立和稳定了他在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地位。相反，由于国民党“清党”以来的血腥屠杀政策，在严重打击共产党的同时，也重创了国民党自身，蒋介石不仅未能与党内原有派系，如“西山会议”、元老等派系弥合裂痕，又新添了如“第三党”、“改组派”，以及在“二次北伐”过程中形成的李宗

仁、冯玉祥、阎锡山等内部政治、军事竞争对手，更对其最高统治权构成了严重威胁。

“二次北伐”后，蒋介石依据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宣言“军政时期”即告结束，此后将进入“整顿与建设”新国家的“训政时期”。在政权建设方面，他与胡汉民合作，组成五院制政府，出任国民政府主席，推行国民党一党专政，“以党治国”。在内政方面，他召开财政会议、经济会议，采取裁军、减少军费支出，统一财政、军政等措施。在外交方面，他由联俄倒向英美，改采与列强妥协的“修订新约”外交政策，而对苏联则不惜唆使张学良挑起中东路事件，引发边境战争，遭致全面失败。

蒋介石在国家满目疮痍，人民啼饥号寒之际，提议裁军缩编，减少军费支出，本是应社会需要，得民心之举。但是，他却私心自用，打着“中央”旗号，将国家军队视为私家军，并在自身实力不足的情况下，急切“横柴入灶”，强力推行损人利己的编遣计划，企图借此削弱同样参加过“二次北伐”的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等军事集团的实力，因而遭到后者的武力抗争。1929年4月，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首先揭开反蒋战争的序幕。随后，冯玉祥、张发奎、石友三、唐生智等为求自保也前仆后继，先后起兵。1930年4月，更爆发阎、冯、桂系联合反蒋的“中原大战”。阎、冯等不但投入全部兵力，在陇海、平汉、津浦铁路沿线与蒋介石所部展开激战，还与“西山会议派”、“改组派”在北平召开“扩大会议”，组织“国民政府”，对抗南京国民政府。

依靠职务和资源上的绝对优势，以及“联甲倒乙，拉丙图甲”的策略与攻防结合等战略战术，蒋介石虽然取得讨桂、讨冯、讨张（发奎）、讨唐（生智）和“中原大战”的胜利，暂时统一了国民党各军事集团。但是让他始料不及的是，曾遭其“清党”沉重打击的共产党，在毛泽东创建、发展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和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指引下，竟奇迹般地在这时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不仅创建了新型武装——红军和赣南闽西

中央根据地，还在湖南、湖北、安徽、河南、广东、广西、浙江、江苏、陕西等省建立了众多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为此，蒋介石在1930年10月“中原大战”获胜后，随即剑指各地的中共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他连续三次调集重兵，对中共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势。不过，此时的中共已不是蒋介石当年发动“四一二”政变时的中共，红军更非阎、冯、桂系等反蒋派的军队可比，蒋介石的三次军事“围剿”，无一不以失败告终。

在国民党内部，蒋介石继续操弄政治，压服异己，就在蒋介石对中共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发动第二次军事“围剿”之时，他又一次亲手为南京国民政府制造了新一轮的政治危机。1931年2月28日，因立法院长胡汉民坚决反对他接过北平“扩大会议”的旗子，假借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的名义，进一步个人集权，垄断政权，蒋介石居然罔顾法制，将胡汉民囚禁于南京汤山总司令部，并于5月5日按期召开所谓“国民会议”，通过《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蒋介石的专制独裁，再次激起国民党内乃至全国舆论的普遍不满，并由此促成国民党内以粤籍人士为主导的胡汉民派、孙科派、汪精卫派、“西山会议派”、两广地方实力派，以及其他反蒋势力的大联合与限令蒋介石“引退”的局面。一场新的政治危机，再次向蒋介石汹涌袭来。5月27日，反蒋各派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正式宣布成立“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相对峙。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的头件大事，就是整顿、扩充武装力量，准备对蒋宣战。7月21日，粤方正式颁布北伐讨蒋令。9月1日，下达出师讨蒋总动员令。13日，粤、桂军分五路向湖南进攻。同日，蒋介石公开宣布粤方反蒋各派系的军队为“叛军”。宁粤之战，一触即发。后因突发“九一八”事变，才意外改变了这一走势。

“九一八”事变，暴露了日本蓄谋已久的侵略中国的野心。随之而起的团结御侮、共赴国难的呼声，迫使本已剑拔弩张，一心想在战场上—决高低的宁粤双方，不得不面对民族危亡的现实，坐到了和平谈判桌